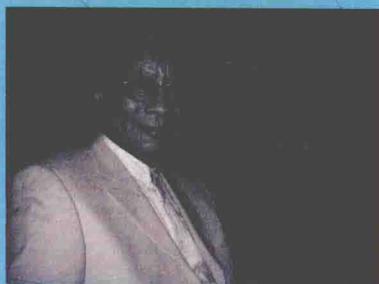


學問

中华文艺复兴论 3

李 森 主编 林建法 宗仁发 执行主编



南方出版传媒·花城出版社

學問

中华文艺复兴论 3

李 森 主编 林建法 宗仁发 执行主编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学问：中华文艺复兴论. 3 / 李森主编.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 9

ISBN 978-7-5360-8035-5

I. ①学… II. ①李…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8605号

出版人：詹秀敏
策划编辑：林宋瑜
责任编辑：林 菁 揭莉琳
特约编辑：林建法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庄海萌 程俊睿

书 名	学问：中华文艺复兴论. 3 XUEWEN; ZHONGHUA WENYI FUXING LUN. 3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6 3插页
字 数	240,000字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eph.com.cn>

云南大学中国当代文艺研究所

《学问》丛书学术委员会：

顾问：

李泽厚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学院院士

李欧梵 哈佛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刘再复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座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高级研究员

欧阳桢 (Eugene Chen Eoyang)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

主任：

吴松 云南大学原校长、教授

委员：

陈安娜 (Anna Gustafsson Chen) 瑞典国家图书馆馆员、汉学博士、翻译家

陈益 (Samuel Chen) 牛津大学研究员

陈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曹意强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达西安娜·菲萨克 (Taciaa Fisac) 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教授、汉学家

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贺麦晓 (Michel Hockx) 伦敦大学教授、汉学家

胡晓真 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所长、研究员

李森 云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学问》主编

鲁晓鹏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

林建法 《学问》执行主编、《当代作家评论》原主编、编审

刘伟冬 南京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罗然 (Olga Lomova) 捷克查理大学教授、汉学家

干野拓政 (Senno Takumasa) 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汉学家

石江山 (Jonathan Stalling) 美国奥克拉马大学教授、汉学家

孙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王德威 (David Der-wei Wang) 哈佛大学讲座教授

杨慧仪 (Jessica Yeung) 香港浸会大学教授

叶波 (Paul van Els) 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汉学家

俞晓群 北京海豚出版社社长

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哈佛大学教授、汉学家

宗仁发 《学问》执行主编、《作家》主编

目 录

中华文艺复兴论坛

- 001 李欧梵 《从“身体”到“世界”：晚清小说的新概念地图》序言
- 008 张春田 “众声喧哗”之后
——晚清文学研究再出发
- 017 李海燕 著 龙晓滢 译 适于发表的情感
——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八年中国的言情群体与文学的公共领域
- 040 南 帆 刘小新 陈舒劼 巨大碰撞的持久回响

诗品

- 046 敬文东 叹词魂归何处？（上）

百家

- 072 南 帆 南帆散文选
- 098 林秀琴 日常生活、介入与散文的力量
——读南帆的散文
- 112 [美]罗鹏 (Carlos Rojas) 序言：后人类在中国
- 114 王晋康 “后人类时代宣言”
- 119 [美]罗鹏 (Carlos Rojas) 原人与后人类
- 124 宋明炜 后人类问题：科幻小说及其他形式
- 128 陈楸帆 《荒潮》中的赛博格：从理论到文本

134 曾 军 多维乌托邦：《三体》未来想象的中国逻辑

文心雕龙

140 孟祥春 重估利维斯的批评传统

春秋

161 徐 强 陶光行实辑考

民国学术

201 季 进 王 洞 整理 编注 夏氏兄弟通信选刊

游于艺

221 王 新 电影大师李沧东还能进步吗？（上）

同文馆

232 [瑞典]斯图勒·阿连 (Sture Allén)、谢尔·埃斯普马克 (Kjell Espmark) 著
[瑞典]万之 (Maiping Chen) 译 诺贝尔文学奖导论 (下)

《从“身体”到“世界”：晚清小说的新概念地图》^①

序言

李欧梵

研究晚清小说，有相当大的难度。我个人断断续续研究了二三十年，至今未能成书。最近读完颜健富教授的大作后，决定放弃写专书的计划，因为我发现晚清文化的最关键性问题，在颜教授此书中已经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我乐观其成，不必再费心力了。

我认为晚清文学的最大难点是：在这个时期（约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一年，特别是二十世纪初的十年）受到政治和社会潮流的影响，生产了大量的文本：包括小说、诗词、翻译和其他“次文类”，在风起云涌的印刷文化机制——书店，

【作者简介】

李欧梵，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生于河南太康，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美国哈佛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荣誉博士。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中国文学荣休教授。二〇〇二年被聘为“中研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讲座教授，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现代文学及文化研究、现代小说和中国电影。著述包括《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中英文版）、《中国现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中西文学的徊想》、《西潮的彼岸》、《狐狸洞话语》、《上海摩登》、《寻回香港文化》、《都市漫游者》、《世纪末吃语》等。

^① 颜健富：《从“身体”到“世界”：晚清小说的新概念地图》，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4。

和报章杂志——推动之下，为中国文学传统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更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奠定基础。然而，这个改变，表面上却看不出来，也不受当时精英知识分子的重视，由于它的文体仍然是旧的，文言白话兼用，但文字一般并不精炼，新的文类也好像不能登大雅之堂。后世学者必须花很多功夫整理、研究和评估，才能还其真面目。

多年来致力晚清文学和文化的学者不少，特别在资料搜集和整理方面，成绩辉煌。然而这些资料性的研究只能算是初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总体的轮廓，也为文本的细读和分析作准备。前辈学者（包括阿英和鲁迅）大多只能泛泛而论，或选其中最著名的文本（如所谓“晚清四大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孽海花》和《老残游记》）为例，但对于其他大量不见经传的作品则避而就轻或略而不谈，有待年轻一代学者进一步探讨。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可谓是此中的里程碑，他把晚清所有的重要文本搜罗几尽，分门别类详加分析，成绩有目共睹。然而，此书仍然不免沧海遗珠，而且方法的背后是文学理论而非历史，所以对于某些关键性的问题未能兼顾。

什么才是最关键性的问题？简而言之，我认为就是晚清文学中时间和空间观念的改变，两者皆直接与历史背景有关。颜教授此书的重要贡献在于把晚清小说中“空间”——他用“概念地图”这个名词来概括——的问题分析得十分透彻。他花了极大的功夫，找到以前被学者忽略的文本，加以细读，发前人所未发的洞见。本书的第一章：《“世界”想象：广览地球，发现中国》，就出手不凡。晚清的“世界观”是由“五大洲”的模糊印象急剧发展为“万国”的想象，并由此进入科幻小说中的“乌托邦”，这一大转变，可谓惊天动地。颜教授从大陆名学者如邹振环、熊月之、葛兆光等人的著作出发，继续深入，从“奇境”和“异域”的分析及“远游”的叙事方式，一步步展示出晚清的新世界观。最后又讨论梁启超译自日文的《世界末日记》（只差没有参考 Camille Flammarion 的法文原著），并引出大量学者忽略的文本和资料。颜教授不但开展了一个晚清小说研究的新视角，而且为这一代的学者建立了一个新的典范。

这个叙述空间的发展是渐进的，而且蕴含几个阶段和层次。一般学者大多总结为“家国想象”，意指晚清小说已经建构了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形，然而它由何而来，如何建构，却语焉不详。其实在晚清文化的语境中对于“国家”、“国体”和“民族”的论述，仍然处于探索阶段（见本书第五章），并没有完全体现西方学者所谓的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模式。中国如何从传统的“大

一统”帝国演变成现代的民族国家？在晚清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如何显现？这是一个大问题。一般学者往往直接借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的理论，认为晚清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已经铸造了一个现代国家的“想象社群”，其根据就是安德森书中所讨论的“印刷文化”，特别是报纸。然而作为一种现代媒体的报纸又如何用来展现这个“想象社群”？安德森自己在书的第二章中分析得也不够完整，仅仅借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共时性”（homogenous time）的观念，又语焉不详。其实这个问题很复杂，牵涉到一种时空相应的“共时性”，而这种共时性的主轴是一种社群共有的“现时”（jetztzeit）的时间观念和价值。换言之，新的空间的想象必须和“现代性”的时间观念连在一起，才有意义，两者是互补互动的。安德森是研究东南亚（特别是菲律宾）的历史学家，他在书中只用了一本菲律宾的小说为例，也只谈小说开头的宴会，消息传出来人人皆知，这是基于空间的叙述。他并没有仔细讨论这本小说的叙事技巧和文体问题，换言之，就是如何把叙事的想象时间和现实的时间挂钩的问题，他更没有谈菲律宾小说的叙事技巧，只略略带过这本小说如何打破西班牙小说传统的问题。小说可以用报纸作为媒体连载，但其形式不等同于报纸，所谓“想象”，势必要依赖小说本身的“虚构性”。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在安德森的下一本书《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中才做了补充。

研究中国文学的不少学者立刻借用安德森的理论，似乎有点匆促而草率。其实晚清小说的坐标系统仍然是传统的“老大帝国”，小说中的“中国”的空间观念更是从传统演变出来的。晚清的大量翻译和小说的贡献在于：它把想象的中国版图和“世界”的观念和想象接轨，用作者颜健富的说法，就是：“以‘末日记’与‘未来记’的极端叙事场景，将‘中国’置入‘世界’的坐标，重新想象／评估／定位中国的位置”（第10页）。这一个过程，在各种小说的新文类（或可称之为新创的“次文类”）中逐渐展现，从“远游”到“冒险”到“乌托邦”和“仙人岛”，琳琅满目，在颜教授书中皆有精彩的分析和描述。对于此类小说，颜教授在第二章（“冒险”精神：何迥《狮子血》“支那哥伦波”的形塑）和第五章（“仙人岛”转调：论旅生《痴人说梦记》的空间想象）中，以两本不受重视的文本为例做了极为细致的解读。而第四章讨论的正是“乌托邦”的概念旅行和由此而生的叙事问题，从西方乌托邦的传统脉络一路推演

下来，经由严复、梁启超和马君武的翻译，进入晚清小说的叙事语境，并举出大量文本资料为例。我认为这一章是本书的精华。第六章（“身体／国体”观：“病体中国”的时局隐喻与治疗淬炼）则把域外的乌托邦世界收入中国，而进一步讨论国家和国体，和与之相关的国民和国民性（第七章）问题。第三章讨论晚清对于“忠义”的演绎，又把第六和第七章联系起来。虽然大部分的篇章皆曾以单篇学术论文在学术刊物发表，但纳入本书后，自成体系，可见这些表面上单独的课题是互相连贯的，不仅如书名所言，织成了一个“概念地图”，而且隐含了一个“论证”（argument），几乎无懈可击。从我的研究立场看来，只差没有仔细讨论上面所说的叙事时间问题，以及它如何和叙事空间连接的问题。且以晚清的新文类“乌托邦”科幻（一作“理想小说”）小说为例。

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中关于“乌托邦”的资源相当匮乏，因为传统的时间观念不是直线向前进行的，在朝代更替的“轮回”（cyclical）观影响之下，中国传统的乌托邦模式不是前瞻未来世界，而是对于过去的憧憬，如《桃花源记》。除此之外，中国一向以“中土”自居，对中土以外的世界兴趣不大，虽有不少神话传说，但描写依然不足。天朝的中国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天朝之西是昆仑群山，天朝以东是海，传说乃仙岛所在。晚清作者把这些“异域”或“奇境”和西方的海洋世界接轨并赋予现代意义，已经很不简单。但如何在叙事上展演？这不仅是观念的改变问题，也牵涉到小说叙事的时空模式和方法。

我认为晚清小说家在“空间”想象方面的发展远远超过“时间”转换的描述，前者的开展时有新意，而后者似乎没有随之而改变。这一个“矛盾”现象，使得晚清小说在总体上既“进步”又“退步”，王德威以英文“involution”一词概括，这是一种文学理论的语言，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可以视之为时空落差的问题。在此我只能简单地提出几点假设和论证，希望以后继续深入研究。我的初步假设是：随着地理思想观念（也就是空间观念）的改变，晚清小说中叙事方法势必自觉或不自觉地也调整 and 改变，但策略如何？

意大利学者莫瑞提（Franco Moretti）认为：文学形式的“进化”（他自认是文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的信徒）不是突变，而是“渐变”，而且变的不是主要文类，而是往往不受注意的“枝节”；小说作者不是建筑大师，而是“泥砖匠”（bricoleur），其“新意”也往往不自觉地出现在这种浑水摸“泥”，堆堆砌砌（bricolage）的叙事方式之中，而取得另一种新的作用，它称之为重新转

变文体功能“refunctionalization”^①。我觉得莫瑞提的这个理论倒颇适合晚清小说的叙事实践。总体而言，晚清小说在形式和语言上还谈不上全然创新，然而在某些小节上是否可以窥见一点变革的端倪呢？

晚清的作者显然从翻译小说中学到不少叙事技巧的方法，和传统不尽相同，但表面上并不显眼。在这方面，林琴南功不可没，他虽不懂外文，但仍然在翻译的过程中或删或改，解决了不少中西小说叙事上的分歧，例如他的译文不用章回小说每章开端的诗词对联；有时把叙事者“我”的姓名直接道出（如《茶花女》）或加上批注，但还是没有完全解决西方小说叙事观点的问题。刚过世的美国名学者韩南（Patrick Hanan）就曾写过论吴趼人小说中的“叙事者”的专文，认为其角色和功能皆已改变，介入故事的主动性加强了许多。吴氏在《九命奇冤》故事开头用倒叙手法，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些都是叙事枝节上的例子。除此之外，与本书主旨更相关的当然是叙事时间的问题。在这一方面，颜教授没有多说，容我补充几句，或可作为此书主题的一个“变奏”。

本书的第五章论《痴人说梦记》的空间想象，十分精彩。故事从秦始皇派方士寻找仙山的架构上，衍生叙事，但其时间架构很传统，以贾父所作的一个梦开始，然后是子辈人物贾希仙寻找父辈的仙人岛，终于在海外寻得，显然将传统的仙人岛“接枝”到现代乌托邦。只不过内容变了：耕田种地、免课税等传统议题，被科技和民主的理想社会所取代。颜教授从“空间”的角度逐步推演这本小说中涉及的地理和“中国中心”等内容和价值问题，最后归结到此书可以作五四“德先生”与“赛先生”议题的先声。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还要用如此传统而保守的父亲之梦作叙事的幌子？何不干脆从儿子的主观观点直接切入，或从一个第三者的客观观点直接叙述航行异地发现异地乌托邦的事？诚然，本书第二章讨论的《狮子血》已经露出某些端倪。颜教授引了我的话说：“小说叙事技法未必成熟，可是颇有‘泥砖匠’的堆砌之功。”（第50页，其实是我取自莫瑞提的“泥砖匠”说法），叙事用倒叙手法，呈现不同于“故事时间”的“叙事时间”，但“未必能切合时人的阅读习惯”。也许这恰是这本小说创新但未受重视的原因之一？一方面好迎合当时的读者，一方面有收到西方小说的启发；一方面用中国传统的“梦”作为幌子，另一方面又把其一部分内容变成“乌托邦”，于是把将来和过去接上了。然而仍然是一种“半调子”的手法。

^① Franco Moretti, *Modern Epic: The World-System from Goethe to García Márquez* (New York & London: Verso, 1996), pp. 19-21.

从负面的角度看，作者在讨好读者“约定俗成”的阅读习惯的同时，也把小说的“现代性”拖累住了。换言之，它的叙事时间比不上叙事空间那么新颖。吴趼人的小说《新石头记》更是如此：第一部先用贾宝玉的一个梦作时间的“虚构幌子”（fictional frame），把故事先带到“现今”（小说写作的“共时”），描写晚清各种“维新”趣事，然后在第二部突然进入一个新世界，于是“贾宝玉坐潜水艇”的场面出现了，还有气球、地铁、火箭、大炮等新奇科技和武器，但展现的“理想国”依然是道家的“小国寡民”农业社会的雏形，只不过卫生和科技设备更先进，但道德价值还是儒家挂帅。且不谈其内容，从叙事方法而言，其时间转换——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的过程十分模糊，也是用一个梦交代。总而言之，“梦”取代了时间的变迁。这在中国传统说部——从唐传奇到晚清小说——屡屡出现，已不足为奇。但鲜有梦到将来世界的。董说的《西游补》算是一个例外，内容中有一小段描写孙悟空一个跟斗掉进“将来”，但没有详叙，未几又回到过去世界。梦的作用并非与导引将来有关。

西方的乌托邦小说引进中土时，有的也以梦作为幌子，但价值和作用大不相同。传教士李提摩太引进中国的美国科幻小说《回头看》（*Looking Backward*），^①描述的是二十世纪的理想世界（波士顿），主人公在一八八七年（即作者写此书的年份）做了一个梦，到了小说结尾（二〇〇〇年，二十世纪最后一年，也是二十一世纪第一年）他梦醒了，时间坐标十分清楚。妙的是在故事结尾，主人公应该回到十九世纪他写作的年代（一八八七），但随后发现原来那也是一个梦，二〇〇〇年才是“现实”。这个结尾有点牵强，但明显指出作者对他心目中的理想世界的向往。另一本有关将来世界的小说，较《回头看》更早，作者是荷兰人，书名叫作《AD 2065》，指的是此书出版后一个世纪。小说也以叙事者的梦开始，进入未来世界的伦敦，在第一章就发现伦敦的大钟有三种世界时间的时针！然而此书的中译本《回头看》（译文典雅，并有详细批注），也没有受到当时读者的注意。反而在日本掀起一阵“未来学”的思想波澜。

众所周知，《回头看》这本小说直接影响梁启超自己写的《新中国未来记》，这本小说第一章开头把故事发生的时间定在“新中国建国六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上，然后倒叙回去。然而，故事没有持续，第二章转为两个人物的辩论，第三章更“离谱”，改叙当代上海，和原来的主题完全不符。虽然梁启超早在

① Edward Bellamy, *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这本小说至今在西方还算是经典，不断重印。

一八九九年末写的《汗漫录》(夏威夷游记)中已经提到中国应该改用公历的必要,理由也是和世界其他国家接轨(基于空间的考虑),他并没有用这本创作为“未来学”铺路,或为中国的乌托邦小说奠基。

与乌托邦对应的“末世”小说,似乎对梁启超更有吸引力。他从日文翻译的第一本小说就是《世界末日记》,颜教授在书中也讨论到了。值得注意的是:梁把这本小说作为“进化论”的反面教材,和原作者的旨意不同;而且着重的也是地理“空间”——地球冷却后世界的凄惨景象。但故事开头的坐标(从地球有生物,凡二千二百万年,到人智开发期二百万年)并不明确,这个“将来”太遥远了,文后又加上“译者注”,大谈佛家华严宗,道德意味甚浓。而包天笑杜撰的同名小说则干脆把时间设在“一亿万而后”,更是遥不可及,内中还有一位“老博士”,自称笃信释氏轮回之说。其他不少以将来世界为题的小说,如《乌托邦游记》《电世界》《空中战争未来记》,多注重科技和战争武器的描写,对于时间语焉不详,故事也往往不完整,或没有写完就被腰斩。

对我而言,十九世纪以降的西方小说叙事技巧的理论背景,就是现代性的时间观念:时间是“往前走”的,由过去经现在而未来,这种“直线前进”(linear progression)的观念和价值,取代了远古(荷马史诗时代)的“古今不分”(本雅明的“共时性”homogenous time的原意)和“轮回”观念。西方小说的发展和演变和现代性的时间观念分不开,有了“直线前进”的观念,小说叙事才会有“倒叙”的必要,也才会出现“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当然后者又和基督教的末世(apocalypse)传统有关,才会产生“未来记”与“末日记”两个极端。晚清的小说家对此无甚敏感,因为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念并非如此。即使有例外,如《狮子血》,其着重的依然不是时间而是空间的细节。倒叙手法基于时间的先后,《狮子血》的目的并非如此,反而用在侦探小说,可以制造悬疑和紧张的题材很契合,吴趼人的《九命奇冤》开头用了倒叙手法,可惜技巧也不佳,并没有达到莫瑞提所说的“refunctionalization”功效,原因是作者本人相当保守,不见得赞成现代性,否则当可从倒叙手法发展到不同的主观观点。

总而言之,研究晚清文学,十分辛苦,必须阅读大量作品,沧海捞珠,难得颜健富教授抓到了一个最关键性的空间问题,并找到被忽略但值得我们重视的“冷门”作品,细加分析,将之置于晚清到民初的文学史脉络中,功力深厚,也功不可没。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日于香港九龙塘

“众声喧哗”之后

——晚清文学研究再出发

张春田

当二〇一三年初徐志伟兄来信约请我参与他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前沿问题读本”计划，承担其中“晚清文学研究读本”的编写任务时，我是既兴奋又惶恐。兴奋的是，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虽然已不再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样声誉显赫，但在很多方面依然保持着一贯具有的活力和锐气，不仅延续过去的探究方向进一步向纵深拓展，而且在诸多议题上都有新的突破，或者提出新的论辩——晚清文学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个表现。然而，大部分文学史教材却仍陈陈相因，严重滞后于学术界的最新发展。以这样的教材作为学生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时的基本参考资料，对他们的知识状况、趣味养成乃至批判性思考的培养都不是那么有助益。如果能有一系列汇集重要研究成果的专题读本出现，对于热爱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后学的登堂入室，对于学科发展

【作者简介】

张春田，一九八一年生，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学士（二〇〇四）、北京大学文学硕士（二〇〇七）、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博士（二〇一二），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曾在海德堡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香港理工大学访问研究或短期任教，著有《革命与抒情》《女性解放与现代想象》等，编有《另一种学术史》《讲坛上的中国》等，译有《哈哈镜：中国视觉现代性》，另有论文多篇。

的展望与反思，乃至对于大学人文学科教学方式的改进，都会有重要意义。所以，看到志伟兄关于读本的整体设想，以及他别具只眼地把“晚清文学”作为其中一个主题，我的确从内心中热切地赞成。不过，我个人对晚清文学研究充其量也只是个初入门者，既不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又在学力、阅读量、眼光和思考上都有很大局限，实非操此选政的最佳人选，因此惶恐不安。不过，在志伟兄的鼓励下，我还是勇敢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回想起自己求学的来时路，当年王晓明老师主编的三卷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外加一本《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正是我和一批朋友们本科时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最重要的参考书，那四卷“读本”对于一个普通本科学生的冲击力之大，让我记忆深刻。可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我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和文化研究的浓厚兴趣，它所体现出的对于“中国”“现代”的关怀，也让我深刻感到“学术”作为“志业”的意义所在。既然如此，如果能够为面向更年轻同学的读本贡献一点力量，为有兴趣继续探索者提供一幅大致不算离谱的地图，那又何必太过在意自己的资历呢？

这些年来，晚清文学研究的热潮方兴未艾，吸引着众多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杰出学者投入其中，也产生了一大批深具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在以“现代性”为主导问题意识的新学术范式中占据重要位置，其辐射力也远远超出了“晚清”和“文学”的范围，与更广泛的人文关切相互对话。作为这种趋向的反映，本读本在编写时，注意到以下几个方面：既收录了传统学科意义上的“晚清文学”领域的研究论文，又涵括了一些从跨学科视野出发对晚清文学及其历史文化语境进行多角度考察的论文，以体现出我们所推崇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的双重开放性；所收论文主要是以中文写作和发表的论文，也包括少数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的，以尽量呈现晚清文学研究在中英文世界的学术发展近况；大部分选文发表于二〇〇〇年以后，代表了研究的前沿探索，但也保留了一些此前发表的、经过岁月淘洗已经“经典化”了的论文，以见研究的渊源和承传；作者既有来自内地、香港和台湾的华人学者，也包括身在欧美的中国研究领域的学者；我们既重视长期耕耘、成绩卓越的知名学者，同时，也关注凭借扎实的学术成绩慢慢崭露头角的学界新秀，学术文章本身的质量是我们选文的最主要标准。

我们以李欧梵和陈建华两位先生（下皆省去敬称）的《帝制·共和·复古》作为全书的代引言。这是一次学术访谈的记录稿，在这次“认真的闲聊”中，两位晚清文学研究的“重量级”前辈就晚清文学和文化的多个议题展开了深入

的讨论，妙语不断，学问性情兼备，读来真是应了《世说新语》里的那句话：“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李欧梵早年就研究过林纾，近年又重返晚清文学研究。在二〇一一年发表的《帝制末的文学：重探晚清文学》一文中，他就提议从文本和史料出发，“向历史敞开”，在新的问题视野中重访晚清文学。而这篇《帝制·共和·复古》更是把晚清文学作为“世纪末”的文学，放到中华帝制末期复杂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中去看待，又从晚清文学延伸到如何认识传统和现代性等更广阔的问题。他们没有把晚清文学简单作为一个学科对象来对待，而是不断开放它的边界，以各种独特问题意识进入历史，来激活对象的潜力，进而实现历史和当下的有效对话。对于人文研究而言，一丝不苟、步步为营的专著论文固然重要，但像这种生气淋漓、火花不断，虽不那么严密，但能刺激思考的学术对谈，也很可贵。从这里可以看到真正有生命力的学术，是如何不受限于表达形式，而始终与不懈的智性追问，与广博的人文关怀紧紧联系在一起。以这篇作为代引言，除了思路上值得参考以外，还希望读者感受到学术态度上的开放进取，毋固毋我。

“总论”部分，选择陈旭麓的文章，希望呈现晚清社会特别是文化方面的具体语境，晚清文学正是在这样一种新旧交替的浪潮之中孕育而成的，传统遗存和舶来的“欧风美雨”同时在发生影响。同时，我们也想提醒在考察晚清文学时，不能没有基本的历史感。李欧梵的文章把“现代性”的理论视野带入了对晚清文化、文学的观察中，“现代性”的确是晚清中国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一时期，中国既追求现代性，同时也对现代性充满着反省或者抵制，“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王德威的名文《被压抑的现代性》影响深远，他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追问，更开启了后来关于“晚清”和“五四”何者才是中国现代性的“起源”的持久争论。此文值得关注的，除了关于压抑/被压抑机制的讨论，还有他对晚清文学主题的自出机杼的概括和阐释。文学研究当然都带有各自的文化关切，但文本解读的本领永远是文学研究的基本功。

晚清文学与晚清思想变革之间有着莫大关系，晚清思想丰富而又重要，可以说奠定了整个现代中国思想的基础，很多思潮、主义都是在晚清时萌发形成的。在“思想”部分，以张灏关于“转型时代”的论述开始，继之以李泽厚关于“启蒙”和“救亡”的讨论，这两篇文章能够帮助我们大致廓清晚清思想领域的基本命题。王晓明把晚清视作“中国现代早期”的开始，他梳理了这种“现代早期”

的问题关怀和思想脉络，这些关怀和思想在当时的文学和更宽泛的写作中都深刻表现。在他看来，广义的“中国革命”为回应“中国如何现代”提供了多种宝贵的想象和实践资源，那些历史纵深处的思想光芒，对于今天“中国应该怎样”依然是最有效的参照。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的鲁迅，其“晚清”时期通常为人所忽视。汪晖近年重读鲁迅早期论文《破恶声论》，展现了鲁迅对于“启蒙”的独特理解，他对晚清流行的主导思潮的反思和批判恰恰构成了鲁迅文学的起点/原点。这两篇文章都揭示出晚清思想的丰富和阔大，而作者自觉接续前人思考的抱负更是让我们再思学术作为“志业”的意义。

文献和资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辨，是从胡适、鲁迅以至阿英等很多治晚清文学的学者都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韩南一直孜孜于中国近代小说研究，对很多文本都做过研究，他前瞻性地提出十九世纪传教士小说问题，无疑为晚清文学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疆土。樽本照雄也是多年埋首于晚清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的学者，贡献深远，从收录的这篇文章可见他一贯的治学风格。

在“古与今”的部分，主要涉及晚清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大传统”的关系，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问题。普实克认为从中国古代文学到现代文学，虽然总体是从“抒情”走向“史诗”的过程，但古典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却仍然延续到现代文学之中，现代作家继承和择取传统文学（尤其是清代文学）的资源，而这一过程也伴随着文类的升降更替。木山英雄通过梳理章太炎和周氏兄弟的文学观，特别是他们在“修辞”、“雅俗”、文学语言等问题上的独特思考，一反大而化之的流行“通说”，展现了“文学革命”与“文学复古”之间并非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两者因应着多重相关因素而辩证地互动，以故“复古”反而可以是前所未有的激进。陈平原的文章讨论晚清小说中的“史传”和“诗骚”传统，实际证明了古典文脉在晚清的延续与衍变，同时把晚清和五四联系在一起谈，更加注重文学的内在理路。章培恒通过重新讨论现代文学的起源，反思了古今断裂论，发出打通古今的提议。形构更具整体性地看待中国文学的视野，尚待来者。

“雅与俗”也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新文学”取得霸权之后，关于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总是将通俗文学轻易地打入另册，但通俗文学在现代文化生产中却从未销声匿迹。王尔敏在对《点石斋画报》的研究中，首先提出了画报和知识普及的关系。范伯群多年治通俗文学，一直主张雅俗文学“双翼齐飞”，建构“多元共生”的文学史体系。他认真考察了通俗小说的兴起情况。